



刊叢究研灣臺

遷變口人的灣臺 遷變會社與

著·馨紹陳

台灣研究叢刊

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

陳紹馨 著



陳序

陳紹馨先生在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與世長辭，已經快滿十三個年頭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把先生刊載於各學術刊物和學術會議紀錄的一部分論著編輯成書，列為臺灣研究叢刊之一冊，梓行問世，可以說是近年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界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陳先生一生從事臺灣社會的研究，他的好友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主任傅瑞德博士 (Dr. Morton H. Fried) 在追念先生的頌詞中說：「陳教授喜愛社會學科，畢生為學術研究盡瘁。社會科學在臺灣有突飛猛進的發展，應歸功於陳教授的努力。」傅教授所說的一點也不是溢美之辭。陳先生在日本東北帝國大學專攻社會學，學成返臺後，在臺北帝國大學繼續從事研究工作。民國三十四年臺灣光復，先生參與政府接收臺北帝大事宜；國立臺灣大學成立後，受聘為文學院教授，主持歷史學、民族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民國三十八年，國立臺灣大學在文學院成立考古人類學系，為該系創始教授；民國四十九年，國立臺灣大學在法學院成立社會學系，又為該系創始教授。先生四十年如一日，為社會科學之研究孜孜不倦，為研究人才之作育循循善誘，今日臺灣的學術研究為世所注目，先生的功績特別值得懷念。

陳先生的研究成就，最受學界推許的，為其人口學研究。本書選輯先生在這方面的遺著六

篇。先生在這方面也用力最勤，他的最後遺著中就有二篇關於臺灣人口的論文提出於民國五十五年在東京舉行的第十一屆太平洋學術會議的人口問題討論會（Population Problems in the Pacific, 11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August 1966, Tokyo）。一篇題作「臺灣近年來的人口變遷」（Recent Demographic Change in Taiwan），另一篇題作「從人口資料所見的臺灣婦女地位變遷」（Changing Status of Women in Taiwan as Reflected in Demographic Data），其觀點散見本書中各篇相關論文，所以未予收入。這次會議舉行的時候，先生雖被邀約擔任社會科學部門討論會小組主席，但因已病情嚴重，未能親自出席，論文只得委託別人代為宣讀。討論會主席陶波女士（Irene B. Tauber）對先生特別推崇，她說：「臺灣近年來來的經濟和人口成長的快速，在太平洋區無可比倫，因此臺灣的經濟和人口問題，為最重要的問題。陳紹馨先生未能出席會議，實為遺憾的事，但會議以能有先生之論文列入紀錄為至大榮譽。」太平洋學術會議以有先生之論文為榮，我們更以有先生在我們學界為榮。

陳先生的社會學是相當廣義的，他不但注意社會現象，也關心文化現象，所以他的研究範圍，包羅甚廣，舉凡家族構成，親屬組織，聚落形態，社會變遷，文化接觸，民間傳承等諸方面，均曾涉及。陳先生對社會科學理論的通達和對臺灣地區資料的諳習，使他所作研究，廣闊而深入。先生以為理論應有充分事實的支持，所以他特別重視資料的發掘。本書所收「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臺灣」一文，初稿發表於國立臺灣大學二十週年校慶文學院主辦的「臺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學術座談會」中，先生指出：「無論如何龐大的對象，科學的研究必須從微小之基本單位著手，從小及大，由淺入深，分析各部分以後再概論全體。」在調查研究的對象

和資料方面：臺灣是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熔爐，除了漢民族外，還有原始民族；臺灣的漢人過去曾一度成爲封閉性人口（closed population），所以可藉此觀察分析中國人口與社會之演變；臺灣在過去百年，有最豐富的統計資料……因此可以說是一個社會科學研究的最佳的實驗室，亦是一個歷史研究最引人入勝的地方。先生的這篇文章，啓發並指引許多年輕學人對臺灣地區研究的興趣和方向。

陳先生以爲學術資料俯拾皆是，不應有高貴和卑俗之分，越是尋常的越具基本性。基於這種看法，先生對民間傳承，尤其諺語的研究，深具興趣。他曾發表許多關於諺語的論文，例如「從諺語看人的一生活」，「從諺語看中國人的天命思想」，「諺語之社會學研究」等等。在「民間文化與諺語研究」一文中，先生說：「諺語是從悠久民族生活經驗中產生出來的萬人共通的智慧，又是社會的公道評斷，以諺語說明一種理論，就是把新理論溶化在人民之生活世俗的道理中，自然能親切體會其真意。換言之，諺語能把『新知識』完全消化，使它成爲我們的知識的血肉。」在替朱介凡先生的「中國諺語論」寫序的時候，先生更具體的指出：「經書或美術工藝固然爲中國文化的精粹，但此等爲屬於少數上層的高級文化；孕育此等高級文化之多數民衆的民間生活文化，才是中國社會生活的基礎。」「多種多樣的中國民間文化中，諺語可以說是民間文化的集大成。現代以前的所謂『民間社會』，各種文化多以口傳心記，從一代傳給另一代，而諺語即是更方便的傳遞工具。因此，從諺語可以抓到中國民間文化的全貌。我們雖有此寶藏，但可惜，很少前往發掘者，甚至有以諺語爲不登大雅之堂者。我們應認識，優越的民間生活文化是幾千年來中國民族得在此地球上繁衍而儼然存在的基礎。爲瞭解、爲改進提高我們自己的社會文化，我們必

須把它澈底分析，而諺語的探討，就是此種工作的最好途徑。」陳先生的這種認識，使他不斷鼓勵後進收集諺語民謠和其他民俗資料，並提倡從事這方面的探討，開發了臺灣民間文化研究無盡的寶藏。

家族是人類普遍的社會單位，宗族則為我中華民族社會的主幹，因之在陳先生的研究中，家族和宗族都佔有重要地位。本書收輯有「姓氏·族譜·宗親會」和「臺灣的家庭、世系與聚落型態」兩篇文章，但是陳先生關於臺灣親屬組織最重要的研究工作，似乎應推他和傅瑞德先生合作的「臺灣人口與姓氏分佈：社會變遷的基本指標」研究計劃。這是陳、傅兩位先生根據臺灣人口普查資料和文獻典籍，用最新的科學方法，對臺灣人口姓氏之分佈，作深入完整統計、分析、比較、與解釋，以求闡明臺灣的人口性質和文化淵源的龐大研究計劃。該計劃定有五項明確目標：

(一)根據民國四十五年九月十六日臺灣省人口普查資料，依戶為單位，而確定臺灣省實際所有的姓氏之數目、種類與出現頻率。(二)確定親族及聚居關係的兩種特殊現象，並加以認明與繪圖。(三)對於村莊人口的組成變遷，依地區別作人口的描述。(四)就幾項範例比較研究臺灣人與外省人。(五)提供一項基本標準與基準線，以便與將來同性質的人口普查資料作比較研究。」該計劃之成果原擬出版三巨冊報告：第一冊為姓氏分佈資料（已於民國五十七年九月出版，26.5cm×19.0cm，XXXV，971pp.），第二冊為社會基圖（已於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出版，38.5cm×26.0cm，60pp.），第三冊則為系統論述。傅瑞德先生在第一冊的自序中說：「本計劃在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遭到嚴重的打擊。這一天罹不治之癌症而住臺大醫院四個月的陳紹馨教授遽然逝世了。他在第三冊裏的原有計劃，即本報告書的分析研究篇，也隨着他的死亡而消失了。這真是我

們很大的損失。」

如果陳紹馨和傅瑞德兩位先生的這個研究依原計劃完成，它將是人類親屬組織研究的最大貢獻。所以陳先生的逝世，不只是該計劃參與者的損失，無疑的也是我國社會科學界的莫大損失。

現在陳紹馨先生遺著的一部分整理出版，我們感到安慰。但是我們更希望有更多年輕學者踏襲先生的脚步，加入我國社會科學研究的行列，我們相信，陳先生在天之靈，一定也會感到安慰的。

陳奇祿
民國六十八年七月

目錄

陳序	一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臺灣	一
臺灣人口史的幾個問題	九
西荷殖民主義下菲島與臺灣之福建移民	三三
臺灣死亡現象之社會學的考察	三五
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	九三
臺灣人口問題	一七九
低度開發地區的人口問題	二三七
姓氏·族譜·宗親會	四〇一
臺灣的家庭、世系與聚落型態	四四三
新學藝在臺灣的傳播與發展	四八七

臺灣的社會變遷	四九五
臺灣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的研究趨勢報告	五二
最近十年間臺灣之都市化趨勢	
與臺北都會區域的形成	五七
附錄：陳紹馨教授著作年表	五一
後記	五七
陳學潛	五七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臺灣

近年來有不少歐美學者，對中國社會、文化的研究，甚感興趣。一些社會科學家欲前往中國大陸做調查研究，由於目前未能進入「鐵幕」，故不得不以香港或臺灣為「代用品」，來研究中國社會。但由代用品，是否能達成其目的？下文擬探討，在臺灣是否能從事有關中國社會的調查研究？

鑑於臺灣曾經日本統治五十年，其間曾發生不少變化，因此有一些外國人，以為臺灣已成日本化的社會。印度經英國統治一百八十餘年；印尼經荷蘭統治一百二十年，但前者未曾英國化；後者也未荷蘭化。中國經蒙古人統治八十八年，經滿洲人統治二百六十八年，但也並未蒙古化或滿洲化。由以上諸事實得悉，雖經長期統治，統治者並不一定能把被統治者同化。

由統治者帶來之物質上的建設或行政制度，對被統治者當然有各種影響，但被統治者的社會與文化，他們的生活方式、家庭生活、宗教或民間信仰、人民的態度等，是不容易變化的。此等是涂爾幹所謂的「社會事實」存在於人們的心中，欲藉外力把它改變是不容易的。如果沒有被統

治者之「態度的變化」來響應外來的刺激，則物質上的建設與行政上的改變，只能有膚淺的影響而已，並不能把社會、文化的「全形」改變。原始基督教派的 Anish 人，雖多年生活在最現代化的美國，但還保持着他們的古老傳統。

統治者的壓迫與榨取，自然引起被統治者的反抗，進而促進他們的團結與固守傳統。在某些情形下，被統治者也會發生態度的變化，因而發生顯著的社會、文化變遷，而這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發生於臺灣的事實。大戰把臺灣捲入近代經濟循環中，大戰中的景氣與大戰後的不景氣，影響到每一個人民的收入與家計。這是未曾嘗過的新經驗，激烈的變化促使人民不再固守古老的傳統而採取新文化因素。同時，大戰後在大陸發生的五四運動與在日本發生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運動，由留學生帶回臺灣，掀起熱烈的文化運動、反殖民主義運動。此等經濟上、心理上與文化上的變化，促進人民改變態度，主動接受新文化，因而引起顯著的社會、文化變遷。有一個例子可使我們了解此等情形。臺灣人自古以來採用農曆，以陽曆的新年為「日本的過年」。殖民地政府鼓勵，甚至強迫人民過陽曆新年，但未能成功。當臺灣留學生在「文化講演」時，對其同胞說：「陽曆比陰曆進步，世界上的文明國家大多採用它，而日本已採用它，所以陽曆的過年並不是『日本的過年』；我們不應因日人採用它，就不採用；凡是好的，進步的，我們都應該採用。」同胞的勸說與統治者的強迫畢竟不同，因而多數人民自願採取許多新文化因素。

清領末期，劉銘傳曾經有偉大的維新措施，但因當時的社會過於保守，故未能成功。日據後，日人以警察力量推行其各種「改良」，故效果甚著。大概如此，人們常以為臺灣的現代化是由日人推行的。但是我們應知道，劉銘傳未能成功而日人成功，是物質上的建設與行政制度的改

進，而不是社會、文化的改變。社會、文化的改變，等於古來所謂的「移風易俗」，必須人民從心裏主動響應，就是態度的改變，才能實現；如無態度的改變，則雖有物質上、行政上的變化，社會文化也不會改變，一如印度、印尼，或美國的 *Angish*。

因為新文化因素是經日人傳入的，而事實有一些自由主義的日人，幫助臺灣人抵抗不合理的殖民統治，所以臺灣的社會變遷不得不帶着一些日本色彩。無可懷疑，這是使人發生「臺灣的日本化」之誤會的原因。事實上臺灣人所採取的，並不是日本的，而是西方的現代文化因素，而日本也不過是不久以前才採取此等因素。臺灣人並不是盲目接受外來文化，而是從自己的立場，自主挑選以後才接受的。日本正在現代化，而臺灣也正在現代化，這絕不是臺灣的日本化。雖曾經顯著變化，但臺灣社會還是中國社會。

臺灣社會雖是中國社會，但它能否代表中國？這是難以回答的問題，而同一問題可以自浙江、河南或其他地方產生。無論如何，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大概我們應研究中國的許多部分以後，才可以提出那些因素或地方可以代表中國的問題。雖然如此，在整個中國裏，臺灣的確有其特徵。就面積而言，臺灣只佔全中國的百分之〇·三七而已，從人口觀點，則佔百分之一·五二。大陸有悠久的歷史，但在臺灣，可靠的記錄則始於第十七世紀初年陳第的東番記（一六〇二年）。大陸有高雅淵博的學藝思想，但臺灣則只有粗淺的民間文化而已。大陸各地的風土人情殊異，但臺灣則很單純。誠然，與光輝燦爛的大陸比較，臺灣是微不足道的，所以由這個「代用品」來研究中國，似乎難能達成其目的。

對此問題，還有一些值得推敲的餘地。我們要研究中國社會，那麼「研究」究竟指什麼？假

如「研究」的重點，在於事實的記述，那麼在中國研究中，就場地而言，臺灣是不足掛齒的。但「研究」應着重理論分析與解釋，而從此觀點就能有不同的看法，雅典或羅馬，雖是光輝燦爛記錄的好對象，但不一定是社會科學分析的最好對象。相反的，Robert Redfield 所研究的幾個墨西哥鄉村，雖然不值得注意，但如研究得法，可從它導致寶貴的社會科學理論，例如 Redfield 的 Folk society 的理論。為理論分析，單純的社會比複雜的社會，時常是更適宜的對象。由此觀點言，臺灣雖不是燦爛描述的好對象，但可以成爲中國社會研究的好對象。

世界上有很多可供研究的資料，但資料的存在與「可供研究」是不同的。爲供研究，必先搜集資料，再經整理以後把未加工的資料 (raw data) 變爲研究資料。研究資料有各種不同的類型，而因應用的資料不同，研究也有不同的類型。在未經探討的初民社會，資料的搜集多靠觀察與田野工作。此等資料的範圍，並不廣大，而其妥當性 (validity) 的審定也不容易。農業社會常有年代記、方誌、或其他文藝作品。此等資料雖寶貴，但大多不以現代科學意識編輯，通常必須經審察以後才可使用。在現代社會則有以科學意識編輯的各種報告、統計，以及社會科學的調查報告，應用此等資料，可做廣範圍的、有系統的研究。以第一及第二類資料，只能做「探討性」的研究而已，但以第三類資料，則能做「記述性」的研究。在大陸，有關社會、文化的資料，大都屬於第二類；但臺灣，自日據以後，有不少第三類資料。此等資料，對中國社會的研究，能有不少貢獻。

在臺灣，自第十七世紀初年以後，就有中文、荷蘭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等文獻。

清代的中文文獻，可說不少，而其大部分已經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或其他機構整理出版，利用

甚爲方便。此等資料均屬第二類。日據以後，有土地、人口、農業、商業、工業、交通、運輸、公共衛生、教育、宗教、犯罪等等的詳細調查報告書與統計。後藤新平對這方面有不少貢獻。後藤是一位醫生，重視「科學的行政」。「爲推行有效的行政，必須先了解土地與人口」，是他的信念，因而排除萬難，舉辦大規模的土地調查與人口普查。此外，他還舉辦舊慣調查，不惜經費，動員日本一流學者，調查臺灣法制、行政、經濟、社會、習俗等事項。

在大陸，一個鄉鎮的人口，有時都不容易知道；但在臺灣，自一九〇六年以後，一個鄉鎮的人口數、出生數、死亡數，都有記錄。戶籍制度的完整，常令西方學者驚訝。不但每一個鄉鎮的總面積，連耕地面積以及主要農產品的年收量，都有記錄。全省與各地，都有各種詳細的地圖。有八次的人口普查與三次的完整生命表，由此可計算一部分完整中國人口的變遷與生命現象。光復以後，還有幾次農業普查與工商普查。利用此等資料，可做中國社會之完整透澈地研究，這點在大陸，目前是還不能實現的。臺灣雖爲中國之一小部分，但就此部分所做之完整透澈的研究，對今後大陸社會、文化的研究，必定有很大的貢獻。換一句話說，目前的大陸，只能做「探討性」的研究，但在臺灣，則能做「記述性」的研究，而以後者來幫助大陸的研究，其功效必定很大。舉例來說，現代化以前的中國人出生時平均餘命若干？隨着現代化，中國人的平均餘命可延長到何種程度？只靠大陸的資料是無法知道的，但利用臺灣之資料，就可算出具體的數字，而此等數字，可使我們切實了解中國社會的情形。

除了完整的資料以外，臺灣還有其他特色值得我們注意。地域狹小、歷史短暫，是臺灣的短處，但同時也是其長處，因小與短，致概觀與概括較容易。在此小地域，除了中國文化以外，還

有山胞、荷蘭、西班牙、日本等諸文化的湊會。日據前與日據後，臺灣大陸間經常有人口與文化交流，但在日據半世紀間，因日人嚴格管制臺灣與大陸間的交流，在臺灣的中國人成爲「封閉性人口」，在這種情形下，臺灣成爲一個「實驗室」，經此可觀察中國人口與社會的演變。這是社會科學研究上的寶庫，社會科學家不應不注意，且該把它善爲利用。

在此「實驗室」裏，我們可以追尋一連串的中國社會、文化變遷：從近代以前的階段，經現代化開始期，以至殖民地式現代化、自主性現代化的階段。

日據以前，臺灣是一個農業社會。一般而言，一個社會須在現代化到某一程度以後，才能做調查研究，然而等到能做調查研究的時候，「現代化以前」的情形已經消失。這是歷史哲學家黑格爾所指明的事理，但臺灣卻是此常理的一個例外。在此階段，臺灣人本身雖不能做調查研究，但有後藤新平其人，拼命去做各種調查，所以剛開始現代化或未開始現代化的時候之情形，也都能詳細記錄下來。例如一九〇五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或一九〇六年以來的生命統計，都是罕有而寶貴的社會史資料，對中國的研究，實具有絕大的價值。

日據期間，臺灣的確有一些「進步」，但所謂進步是從「上面」迫成的，而非從「下面」釀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即臺灣光復後，迫成的進步變爲自動的進步，殖民地式現代化變爲自主性現代化。光復以後之若干變化，可使我們了解上述兩個類型之現代化的不同。日據時期，臺灣是農產品的供應地與工業產品的消費市場，還談不上工業的發展；但光復以後，工業飛躍發展，把殖民地經濟變爲自主性經濟。小學教育與職業教育，在日據時期就有相當的規模，但高等教育被限制得很嚴；光復以後高等教育的發展，的確是值得驚異的現象。日據期間，臺灣人的物

質生活雖有一些進步，但沒有結社的自由；而臺灣光復以後，以民有、民治、民享爲原則的自治，已普遍推行到鄉間。上列光復前與光復後的對照，顯示殖民地式現代化與自主性現代化之所以不同的地方。臺灣的經驗，可供以前曾爲殖民地的其他地方，擬定開發計劃的參考。

爲何中國不現代化，或不能現代化？這是西方社會科學家所喜歡討論的一個問題。有人以宗教社會學來說明此問題，將儒教與 Calvinism 作比較討論。但是如人們不忘記臺灣的存在，不忽略中國的一部分——臺灣，已自第二十世紀初年逐漸現代化，那麼，對上述社會科學上的大題目，我們就應該重新加以檢討。從這個觀點來說，臺灣在中國研究上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地方。

目前有不少西方的社會科學家，在臺灣從事調查研究工作。本來他們只把臺灣視爲不得已的「代用品」，但在研究過程中，逐漸發現其優越條件，漸漸了解，不但在臺灣可以研究中國，在某些方面，臺灣比大陸具備更好的研究條件。有一位美國知名的學者，在其致筆者的私函中曾經說過：「據我的意見，臺灣是歷史研究上引人入勝的地方。」這個「實驗室」對中國社會、文化的研究有何意義，似乎逐漸被認識。如能有整套完整的研究計劃，則在臺灣或透過臺灣對中國的研究，不但能促進整個中國的研究，而且對社會科學本身，也必定有不少的貢獻。

